

【文化杂谈】

被高估的民国学术

□葛剑雄

在社会上出现“民国(小学)教材热”时,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民国时的大师会编小学教材?”我告诉他,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就行,而出版社对编者是按印数付版税的。所以,编教材的版税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编者等于开发了稳定的财源,何乐而不为?至于“大师”,这是现在对这些编者的称号或评介,当初编教材时他们还不具备这么高的身份,甚至还只是初入职场的新人。

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升温,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

不过,如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黄金时代”的呈现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或者相关学术界的共识,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所关注的并非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例如,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钱宾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作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或钱穆的其他著作。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或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其实,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影视创作可以以民国的学术人物为对象,戏说一下也无妨,但他们的真实历史和学术地位不能戏说。

那么,今天应该怎样看民国期间的学术呢?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篇章,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奠基者和创始人,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

从晚清开始,西方的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被引进中国,在回国的早期留学生与外国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到民国期间基本形成了学科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是从西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日本)引进并建立的。就是人文学科和中国传统的学问,也是在采用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学术规范和形式后才进入现代学术体系的,如大学的文、史、哲院、系、专业或研究所,论著的撰写、答辩、评鉴、学历、学位、职称的系列与评聘,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以我从事的历史地理学为例,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沿革地理,属史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研究疆域的变化、政区

与地名的沿革和黄河等水道的变迁,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而中国传统的“地理”也不同于现代地理学,只是了解和研究历史的工具。只是在现代地理学传入中国后,沿革地理才有了历史地理这样的发展目标,才发生了量和质的进步。上世纪30年代初,大学开的课还用“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称,1934年创刊的《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还是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但到1935年就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上世纪5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提出创建历史地理学的倡议,自然是接受了他 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导师、国际历史地理学权威达比教授的学科理论和体系的结果。

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是有国际标准的。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前沿,个别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人文学科的具体人物或具体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但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至于杰出的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远不被超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到了今天,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因为每门现代学科几乎都是从那时发轫或成长的,今天该学科的专业人员,除了直接从国外引进的,一般都是由当初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来、传下来的,这些创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的地位。解放后留在大陆,以后成为大师的学人,大多是在民国期间完成了在国内外的学业,已经崭露头角。尽管他们的成就大多还是在解放后取得的,但也被看成民国学术水平的代表。

历次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更加剧了这样的高估和偏见。有的学科和学人因学术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至于到了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恢复,还只是民国时期的成果独领风骚,一些学者的代表作还是当初的博士、硕士论文。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本来早就应该被他自己的新作或其学生的成果所超越,但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科被“断子绝孙”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科彻底取消。等费孝通当了右派,连《江村经济》也被当成“毒草”批判,从此消失。由于一部分民国学人成了“战犯”、“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走狗”、“洋奴”、“特务”、“反革命分子”、“右派”、“反党分子”,或者去了海外,他们的论著被查禁,像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更年轻的人。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才在专供教师和研究生使用的参考阅览室中看到一些民国学术著作,而直到1985年游学哈佛,才有比较全面地了



▲陈寅恪



▲钱穆



▲吴宓



▲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解民国学术的机会。

毋庸讳言,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是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对某些混迹学林的无术、无良、无耻人物的蔑视,就像赞扬民国时的小学课本编得多好,就是为了对比今天的某些课本编得多差一样,应该促使我们反思、推动当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压制这种另类批评。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末了”。

我每年都要去对岸看望年迈的父母,父亲过世后,我也常去看望母亲。因此,这些年我就成了威海至大连往返轮船的常客。去年暑假我再度搭乘白天的滚装船前往大连。舱内闲来无事,我就漫步于甲板远眺大海,忽地抬头望见一大群海鸥围着大船同行鸣叫,一些低空飞行,一些紧贴海面,另一些则在船的桅杆周围盘旋不停。那天正好晴天,碧海蓝天与海鸥,轮船交相辉映。洁净的海鸥展开翅膀飞翔,不愿舍船离去。就在这“天人合一”的画面中,我顿时感到久违了的来自大自然深处的亲切问候和阵阵暖意……

不知不觉,甲板上已聚集了不少船客。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嘿,哪儿来这么多海鸥啊?飞得这么低,原来还有这玩意

【生活直击】

海鸥与船客

□刘天放

儿。下次一定带个钩子来,肯定能钩下几个,这海鸥一定很好吃!”一位中年妇女随即问:“海鸥肉能吃吗?”“当然能吃了,还是绿色食品呢!”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姑娘随口答道。她的话还引来一番热议。

“小孩儿,把你手里的火腿肠放到那个墩子上,等海鸥来吃了,看看能不能捕到它们。”一个中年男人说。“嗨,直接在火腿肠上抹点毒药,不就抓到海鸥了吗?”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提出建议后引来一阵哄笑。“海鸥真的能吃吗?”一位看似学生的大男孩儿问道。“有啥不能吃的?吃海鸥肉肯定跟吃天鹅肉差不多。”中年男人回应道……

随后,听到的都是该怎样抓到海鸥吃肉的声音。我相信,这些船客中肯定有不想吃海鸥的人,也肯定有人暗地鄙视这种言行。那几个想吃海鸥的船客只是跳出来说话了而已。我在美国访学时,曾拍摄了不少动物的照片。照片中的野鹿、野兔、赤狐、野鸭、松鼠、臭鼬、浣熊等动物与附近的居民、校园中的师生融洽相处,那画面令人倍感和谐温暖。当我把这些照片拿回来给国内的一些朋友看时,有几位朋友说的第一句话竟然也是:“这么多野兔和野鸭,美国人怎么不抓着吃啊?”

吃,怎么一看到动物就想到吃呢?是不是国人过去经历的苦难太多,总想着法儿去吃东西,先把肚子填饱才是正事?吃,无伤大雅,谁离开吃都不行,谁也别笑话谁。1942年的河南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那场“三年自然灾害”,更是成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挥之不去的惨痛记忆。要是没有吃的,什么都干不成。可当下的中国,早已不用再为吃一口饭而拼命了,为什么还要如此这般地只想到吃呢?人们精神上的诉求和灵魂上的满足,只能来源于简单的“吃”吗?除了吃,还应更高的追求吧?

要是从文明历练、文化传承、道德自觉、法制规范乃至宗教自律等方面来谈,以上船客们的言行似不难破解,但这需要一大堆解释。就是解释了,恐怕有些国人也难以听进耳去,也似乎听不懂。他们中的不少人心里想的根本不是该怎样与动物和谐相处,而总是充满敌意地将动物视为敌人并杀死,食其肉而后快。这是缘于什么的悲哀?是文化的糟粕或毒瘤,还是过去黑暗的多代生存困境留下的后遗症?这么多船客,有老有小,想必受过各类专业和职业教育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无论在哪个层级的学校受教育,恐怕都没少接受道德品质教育吧?可为什么大家都在趋之若鹜地谈论吃海鸥呢?是我们的社会环境令这些人欲罢不能?还是国人的本性就是残忍的,压根儿没有同情心,没有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传统?这些好像都不是。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电影《一九四二》还原了当年中原地区的那场特大饥荒,再现了当时百姓经历的磨难,可当银幕上一次次出现骨瘦如柴的灾民为活命卖儿卖女的场景时,观众席上却传来阵阵笑声。当影片中的乡村牧师为冻饿而亡、死不瞑目的人祈祷时,当从饿死的母亲怀中滑落出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时,当日寇飞机把无辜的灾民炸得血肉横飞时……观众席竟有窃笑之声——这声音实在太刺耳穿心了!鲁迅先生曾言“改造国民性”,他早年就是从影片中看到同胞被侮辱和残害后因悲愤而“弃医从文”的。他警告:中国人的精神正在麻木。医生可以治愈身体的病,却治不了国人的灵魂病痛与精神上的疾病。

其实,别说吃海鸥,在中国的餐馆酒楼里,成千上万只野生动物被猎杀,而食客们则兴高采烈地享用。在物欲膨胀的当下,在拜金已把许多人的精神、道德乃至起码的同情心都吞噬的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去尽快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不去下大力气纠正种种荒唐乃至颠倒了的道德观,如果让我们在趋之若鹜地谈论吃海鸥中变成贪婪、麻木、毫无同情心的经济怪物,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就要打多少折扣?

台湾作家林清玄曾说:“所谓美好的心灵,就是能体贴万物的心,能温柔对待一草一木的心灵。”在提高国民素质教育上,大话、套话、空话甚至假话盛行,而真正的“公民教育”少之又少。“假大空”盛行必然导致形式主义的泛滥和低俗文化的张狂。所以,能不能用先进的文化教育国民,会不会用发展生产所需要的社会运行准则来提升国民的人文素养,敢不敢用健康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诚信体系来约束国民,善于不善于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当今的行为准则有机结合并融入国民意识,从而形成崭新、健康、向上的“新国民性”,是对当下中国转型期的一个巨大考验。海鸥与船客之类,不就很令我们警醒吗?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学者、自由撰稿人)